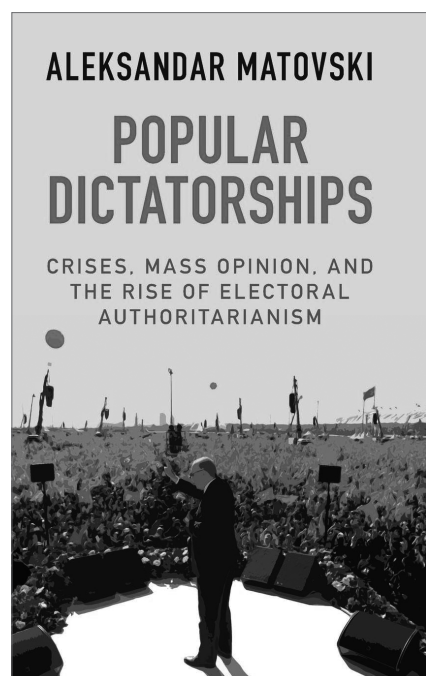


政治強人與民選獨裁

——評 Aleksandar Matovski, *Popular Dictatorships: Crises, Mass Opinion, and the Rise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 劉宗坤

所謂「民主衰退」，顯然不是指舉行選舉的國家少了，也不是指參加投票的選民少了。它是指民主的質量下降了。選舉照舊在進行，但民主的含量愈來愈低，獨裁的成份愈來愈高。



Aleksandar Matovski, *Popular Dictatorships: Crises, Mass Opinion, and the Rise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一 一種新型獨裁模式

2023 年末，美國《時代周刊》(Time) 展望新的一年，稱 2024 年為「終極選舉年」^①。本年度世界上有近七十個國家和地區舉行選舉，其中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個國家中的八個，投票的選民佔世界成年人口的一半，為有史以來最多。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世界民主興盛的一年。但新年伊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卻刊發了一篇悲觀色彩濃厚的文章，標題是個問句：「民主是否能活過 2024 年？」文章表示，儘管今年舉行選舉的國家將創下歷史紀錄，但獨裁統治卻在世界範圍內持續蔓延，年輕一代愈來愈對選舉無感^②。

《金融時報》描述的「民主衰退」(democracy recession) 現象是近幾年媒體和學界經常討論的話題。所謂「民主衰退」，顯然不是指舉行

選舉的國家少了，也不是指參加投票的選民少了。更確切地說，它是指民主的質量下降了。選舉照舊在進行，但民主的含量愈來愈低，獨裁的成份愈來愈高。這種現象既出現在第三世界國家，也出現在俄國等歐洲國家。前蘇聯陣營的一黨專政制度瓦解後，民主選舉從無到有，大部分國家成功轉型為自由民主制度 (liberal democracy)，而俄國卻長期停留在強人統治狀態。是甚麼原因導致了這種分化？是特定的歷史、地緣、族群、文化、傳統，還是其他因素？誰要對俄國不成功的民主轉型負責？是普京 (Vladimir Putin)，還是每次選舉都支持他連任的選民？

傳統上，人們習慣於認為獨裁跟選舉不相容，理所當然地把選舉等同於民主。當然，沒有選舉，肯定沒有民主。但在現實世界中，有了選舉，卻未必有民主。世界在經歷了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講的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後，完全沒有選舉的國家已經寥寥無幾。不過，同樣實行選舉，每個國家的民主化程度卻差距甚大。在俄國、塞爾維亞、匈牙利、土耳其等國，盛行一種新型的獨裁模式，即「選舉獨裁」(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民選獨裁者通過選舉上台，利用選民的支持實行獨裁。跟傳統的獨裁者不同，他們上台後並不取消選舉，而是借助選舉維持長期執政。

2021年，馬托夫斯基 (Aleksandar Matovski) 的著作《民選獨裁：危機、大眾輿論與選舉威權主義的興起》(Popular Dictatorships: Crises, Mass Opinion, and the Rise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以下簡稱《民選獨裁》，引用只註頁碼) 研究了「民選獨裁」這一現象，精闢地指出：「隨着傳統的無選舉獨裁政權在世界範圍內以驚人的速度崩潰，絕大多數倖存的威權國家和1989年以來湧現的幾乎所有新興獨裁國家，都是選舉獨裁。選舉威權主義獲得令人驚歎的成功，同時看起來貌似更強大、更不可一世的一黨專政國家和軍事獨裁國家卻步履維艱。不是在民主倒退的時候，反而是在民主史無前例地擴張的時候，民選獨裁卻傳播開來。」(頁2) 作者不是傳統的書齋學者。他出生於前南斯拉夫，年輕時從政，曾擔任北馬其頓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後由政而學，在康奈爾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現任職於美國海軍研究生院 (Naval Graduate School) 國家安全事務系。他親歷了南斯拉夫解體造成的重大危機和民選獨裁的形成過程，這成為他的研究一以貫之的主題。

本書出版後不久，俄國入侵烏克蘭。不少政治學者試圖從地緣政治角度解釋原因，得出一些相互矛盾的結論。比如，有學者認為北約 (NATO) 東擴導致俄國侵烏，普京發動戰爭是為了維護俄國自身的安全。也有學者認為，侵烏並不符合俄國的安全利益，因為會使俄國西部邊境的安全局勢惡化。事實上，俄國侵烏不僅使北約各國紛紛增加軍費，而且直接導致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馬托夫斯基認為，單純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俄國侵烏是講不通的。理解普京這一舉動的關鍵不是地緣政治，而是俄國的

馬托夫斯基的著作研究了「民選獨裁」這一現象，即民選獨裁者通過選舉上台，利用選民的支持實行獨裁。跟傳統的獨裁者不同，他們上台後並不取消選舉，而是借助選舉維持長期執政。

在很多國家，從獨裁到民主的轉型過程跌宕起伏。在巨大危機中，國民期盼出現政治強人力挽狂瀾，同時又不願回到過去的專制獨裁。這種民情為強人的出場提供了土壤，而強人是民選獨裁的主角。

國內政治——民選獨裁產生於危機之中，也只有在危機中才能存續下去。具體講，普京需要製造一場危機來維持長期執政，北約東擴威脅俄國安全只是侵烏的藉口。2014年俄國入侵並吞併克里米亞，使普京在選民中的支持率達到高峰，然後逐年下降。普京執政二十多年，俄國選民出現「強人疲勞」現象。面對即將到來的2024年大選，他必須製造一場危機來推升支持率^③。

事實表明，馬托夫斯基依據民選獨裁的產生和生存機制對普京的分析，要比傳統的地緣政治分析更有說服力。2021年末，普京在選民中的支持率已經從2015年6月高峰時的89%降至2021年11月的63%。侵烏當月，普京的支持率躍升至83%^④。兩年後，他以88%的得票率贏得2024年俄國總統大選^⑤。儘管《民選獨裁》出版於俄國侵烏之前，書中對民選獨裁的研究顯然有助於理解普京侵烏行為的政治動因。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Mario V. Llosa)曾經把民選的威權統治形象地稱為「完美的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 頁1)。跟二十世紀聲勢浩大的蘇聯一黨專政式極權獨裁(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相比，民選獨裁有個明顯優勢，即通過定期民選而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馬托夫斯基為本書設定的寫作目的是破解民選獨裁之謎(頁3)。第一章是引言，為全書立論及各章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幅路線圖。第二章綜述各國民選獨裁的共同特徵，比如以「強大」為競選和執政口號、利用國家危機上台、憑藉持續的危機執

政、壓制但不消滅反對派等。第三章分析民選獨裁的產生根源，即全國性社會、經濟、安全危機造成前所未有的國家創傷。學界一般認為，民選獨裁在意識形態上是機會主義，第四章駁斥了這個流行觀點，指出民選獨裁訴諸民眾對政治強人的精神訴求，在擁抱強人、製造危機和重視民意授權方面一以貫之。第五章通過對俄國這個經典案例的分析，否定了歷史—文化因素導致民選獨裁的論斷，認為蘇聯解體後的國家危機是促使普京實現民選獨裁的關鍵因素。第六章批評一些學者把獨裁者勝選統統視為「假選舉」的簡單化做法，透過跨國分析，作者認為各國民選獨裁者都擅長利用無解的國家創傷或社會動盪來獲得選民支持。第七章為全書各章的論點小結。

二 社會危機與強人政治

民選獨裁是如何產生的？亨廷頓曾經把1970年代到冷戰結束稱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二十年間，全世界有六十多個右翼獨裁國家和一黨專政國家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化^⑥。時至1990年代，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至少有了形式上的民主，比如反對黨、民主選舉、權力制衡、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觀念深入人心，完全反民主的極權獨裁即便在前獨裁國家的民眾中也不再有市場。

不過，在很多國家，從獨裁到民主的轉型過程跌宕起伏，經常造成社會失序、經濟蕭條和權力真

空，短時期內釀成全國性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在巨大危機中，新建立的民主制度往往無法正常運轉。國民期盼出現政治強人力挽狂瀾，同時又不願回到過去的專制獨裁。這種民情為強人的出場提供了土壤，而強人是民選獨裁的主角。在這個意義上，作者說：「沒有危機，就沒有對強人維持獨裁的訴求。」（頁17）

通過民選上台的政治強人有着極權獨裁者所沒有的執政合法性，並不完全靠暴力鎮壓維持統治，而是「利用民主對付民主」，挾民意打壓反對派，壓制新聞自由、結社自由，並通過高壓手段維護社會穩定，「這種政權並不是通過製造假民主而推翻民主。毋寧說，它們在被混亂和絕望困擾的社會中成功地劫持了民主」（頁5）。

那麼，如何判斷民主選舉有可能被政治強人劫持而蛻變成民選獨裁？作者提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判斷方法，即看競選口號。比如，在蘇聯解體後俄國的危機中，普京通過宣傳和表演等手法把自己塑造成為硬漢領導人，承諾讓俄國重新強大起來，恢復俄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流行的普京宣傳文案中，「強大」是關鍵詞：「偉大的國家需要強大的領導人」、「強大的俄羅斯—強大的總統」（頁12）。

民選獨裁的主要特點是「民主其外，獨裁其中」或「徒有民主的形式而無民主的實質」。政治強人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根據國情採取各種操控手段。有的簡單粗暴，像黑金政治、賄選、票箱造假等，但

風險較大，難以長久。更精明的手段是從長計議，未雨綢繆，溫水煮蛙式地逐步限制言論自由，通過財物控制、製造謠言等非政治手段打壓反對派（頁7）。

值得注意的是，民選獨裁不像極權獨裁那樣，為國民提供一幅烏托邦、「畫餅」式圖景，也不像自由民主選舉中的政黨或候選人推出施政方針，而是基於選民的怨憤和恐懼，根據國情和民情有選擇地訴諸民族主義、宗教傳統等，在意識形態上具備深厚的投機色彩。職是之故，有些學者把民選獨裁稱為「意識形態上無家可歸」（ideologically homeless）的政權，把政治強人的強硬言論視為「廉價的空話」（cheap talk），一切以迎合選民的不滿情緒為目的。作者認為，在既有統治方式失敗導致的危機中，這些看似淺薄的做法恰恰是深得選民歡心的極為有效的掌權手段（頁14-15）。

傳統的極權獨裁消滅所有反對派，不經國民同意而宣稱代表人民。而民選獨裁卻需要反對派，它需要至少表面上公平地進行選舉，通過在選舉中戰勝對手來獲得合法性，凝聚民意。所以在大部分民選獨裁國家，定期選舉不但不會危及政治強人的統治，反而會鞏固選民對強人的支持。民選獨裁者固然會壓制反對派，但不會消滅反對派；他們會操控選舉，但不會取消選舉，因為一旦那樣做，他們的統治就會喪失合法性而遭到多數民眾反對（頁15-17）。畢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過後，否定選舉的極權獨裁本身已經不得人心。

民選獨裁在意識形態上具備深厚的投機色彩。民選獨裁者固然會壓制反對派，但不會消滅反對派；會操控選舉，但不會取消選舉，因為一旦那樣做，他們的統治就會喪失合法性而遭到多數民眾反對。

三 選民擁護與精神需求

作者批評了西方學者對民選獨裁的簡單化認知：每次民選獨裁者在選舉中當選，都會有西方學者把原因歸結為選舉舞弊、給選民洗腦、鎮壓反對派等。不過，南斯拉夫解體後的現實卻並非如此。作者觀察到米洛舍維奇 (Slobodan Milošević) 在塞爾維亞並不全靠暴力鎮壓掌權，而是得到多數選民的擁護 (頁21)。對俄國選舉的研究和民意調查印證了他在前南斯拉夫的見聞。不少學者認為，普京高企的支持率是虛假的，俄國的受訪者假裝支持普京。作者在俄國的實地調查表明，這種看法沒有根據。儘管民調結果有偏差，但大體符合現實中的俄國民意 (頁172)。

為甚麼多數俄國人支持普京執政？一個流行的解釋是，普京有「政績」，他治下的俄國經濟有所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作者認為，這種解釋沒有事實依據，因為普京的支持率並不與俄國的經濟同步。恰恰相反，反對普京的最大規模抗議發生在俄國經濟發展較好的時段，而俄國人團結一致支持普京卻發生在吞併克里米亞之後的經濟不景氣階段。一家獨立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7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收入不平等在普京治下有所加劇，51%的受訪者認為普京政府的腐敗情況惡化。只有33%的受訪者認為生活水平略有提高——這是普京另一項經常被張揚的成就——同時，卻有34%的受訪者認為生活水平事實上下滑」。但是，儘管評價如此之低，在同一項調查中最終卻

有66%的受訪者說，他們在2012年選舉中投票給普京 (頁173)。

作者認為，俄國選民之所以會有這種自相矛盾的行為，根源在於普京上台前俄國經歷的巨大危機。蘇聯解體導致的集體創傷使俄國選民的行為有異於一般民主國家的選民。與大多數一般民主國家的選民不同，俄國選民在投票時不會問：「在普京領導下，日子是不是愈來愈好？」而是會問：「如果換個人掌權，日子會不會更差？」作者就此得出結論：普京之所以得到選民擁護，首先是出於選民的恐懼，不是恐懼普京這種強人迫害他們，而是恐懼沒有了普京這種強人，俄國將重新陷入混亂和動盪 (頁175)。換言之，俄國多數選民覺得，在普京的專制統治下日子不好過，但沒有普京，可能日子更痛苦。

顯然，跟有些極權獨裁政權追求績效合法性不同，民選獨裁的合法性並不來自於經濟發展等政績。良好的經濟績效往往並不帶來民選獨裁政權的穩定，反而會削弱政權穩定。固然有些民選獨裁政權在特定時段的經濟發展不錯，但有的即便經濟發展一直不好，卻能持續贏得選舉，甚至在經濟政策失敗後仍然能得到多數選民支持。而且，政權比較穩固的民選獨裁者很少運用脅迫和操控手段，只有少數風雨飄搖的民選獨裁者不得不靠暴力鎮壓和選舉舞弊來維持政權。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永遠增長，但國民的某種精神需求卻可以持之以恆，甚至愈是遇到經濟困難，愈是高漲。像國家主義、排外主義、沙文主義、擴張主義、宗教

作者認為，普京的支持率並不與俄國的經濟同步。普京之所以得到選民擁護，首先是出於選民的恐懼，不是恐懼普京這種強人迫害他們，而是恐懼沒有了這種強人，俄國將重新陷入混亂和動盪。

民族主義等，在國家遇到危機時，不管是在經濟增長還是衰退時段，都可能高漲起來。所以，民選獨裁單純靠經濟增長等績效無法長久獲得選民的支持；要維持長期執政，它必須滿足選民某種持之以恆的精神需求（頁26-27）。

四 民選獨裁的生命力

民選獨裁不是出自槍桿子，而是出自選票。這種政權不是民選獨裁者強加到國民頭上，而是國民的選擇。那麼，手裏有選票的國民為何要選擇獨裁呢？在國家危機存亡之秋，國民選擇政治強人來領導、用鐵腕恢復秩序，這很容易理解。但為何不乾脆讓強人取消選舉，實施一黨專政統治呢？那樣做豈不是更能維持政權穩定？這種允許反對派存在、保持一定言論自由、定期選舉、民主與獨裁參半的混合政體，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穩定隱患嗎？

作者認為，正是民選獨裁中民主和獨裁參半的混合特點，對被社會動亂和無序搞得焦頭爛額的國民而言有特別的吸引力。他們需要政治強人直接、粗暴地恢復秩序，同時又期望避免曾經歷過的沒有選舉的極權暴政。事實上，民選獨裁的擁護者也從這個角度為這種混合政權辯護：集中權力可以避免自由民主容易出現的失序，定期選舉可以制衡極權獨裁的粗暴統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略薩說世界上「完美的獨裁」不是蘇聯，而是墨西哥——墨西哥在經歷過極權獨裁和血腥暴

力革命的治亂交替後，長期穩定在革命制度黨掌權（1929-2000）的民選獨裁狀態（頁1）。

墨西哥的民選獨裁比蘇聯的一黨專政式極權獨裁有更長久的生命力。後者使革命難以避免，革命的動亂之後往往又回到極權獨裁，然後是另一場革命。歷史記憶激發選民期盼打破那種治亂交替的閉環。他們不希望出現極權獨裁，所以寄希望於每六年舉行一次選舉（不准連任）；同時他們也期望選出有魄力的領導人，用強有力的手段維持國家穩定。這種「既要又要、既不要又不要」的折衷結果，就是長達七十多年、至今仍然有生命力的革命制度黨模式的民選獨裁（頁1）。

換個角度講，民選獨裁是一種開放式獨裁，或者說封閉式民主。國家一旦進入這種統治狀態，就會相對穩定。但是，過往的極權暴政和革命的血腥記憶並不會立即消失，選民不想重蹈覆轍，所以會接受民選獨裁的溫和壓制手段，認為這是為避免危機重演、不得已而為之的「必要之惡」（頁28）。基於這種認知和感受，選民寧肯選擇得過且過，容忍民選獨裁的腐敗、專斷、得寸進尺等侵蝕民主的做法。雖然競選中有反對派，但反對派的能力令人懷疑，選民擔心一旦他們上台，可能讓國家走回頭路，重新墜入動盪和危機中。

由此看來，民選獨裁必須亂中取勝。如果國家沒有出現危機或動盪，政治強人很難成功。他們掌權後，如果國家很快恢復太平，經濟欣欣向榮，新一代選民對危機的傷害記憶趨於淡薄，就不再需要強人

民選獨裁中民主和獨裁參半的混合特點，對被社會動亂和無序搞得焦頭爛額的國民而言有特別的吸引力。民選獨裁者要長期執政，必須借助一定程度的危機，甚至主動製造危機。

作者認為導致普京奠定民選獨裁的不是俄國文化，而是巨大危機。這一結論未免把一個複雜問題簡單化。若把蘇聯解體放到一個更長遠的歷史時段觀察，很難排除歷史—文化因素在俄國人轉向民選獨裁中曾經發揮的作用。

了。所以，從長遠看，民選獨裁者要長期執政，必須借助一定程度的危機。如果沒有危機，他們必須主動製造危機。而且，製造危機的理由必須是長期無解的問題，甚至是永遠無解的問題，比如歷史上曾受過西方列強壓迫、意識形態跟自由民主對抗、宗教信仰面對世俗化衝擊的困境、無法恢復的歷史版圖等。這些問題製造的危機在選民中不會過時，不論經濟好壞都能激發選民的热情和對強人的精神需求。

作者發現，民選獨裁具有強烈的民粹色彩和反精英傾向（頁55-56）。因為是民選上台，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民選獨裁者在掌權後不用擔心被民眾推翻，但會提防來自精英階層的威脅，比如官僚系統挖牆腳、不合作，甚至軍事政變。民選獨裁者上台後，只要能控制精英階層，用無解的問題製造危機，穩固基本盤，哪怕有相當多的選民對他們失望，不去投票，但在反對派不成氣候的情況下，他們也會贏得選舉，保住權力。所以，對民選獨裁者來講，保住權力比獲得權力要容易一些，獲得權力需要得到大部分選民的支持，保住權力只要大部分選民得過且過、不作為就足夠了。這遠比把大部分國民動員起來的獨裁政府要容易（頁39-41）。

五 歷史—文化因素

前蘇聯陣營倒台後，有些國家成功轉向自由民主政體，像捷克、波蘭、羅馬尼亞等；有些國家卻轉向民選獨裁，像俄國、塞爾維亞、

匈牙利等。有研究者認為，這種不同的轉向跟各國的歷史—文化因素有關，比如俄國有崇拜政治強人的傳統。作者不認同這種看法。他引用獨立機構的民調反駁「俄國文化擁抱威權」論：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時，俄國人中有45%認為不能讓一個人獨攬權力，只有25%認為俄國永遠需要一個強人，另外有15%認為當時的情況需要由一位強人來收拾局面。經歷了「歷史上最極權的獨裁統治」後，大多數俄國人願意擁抱遠比俄國曾經有過的更自由的秩序（頁181）。那麼，俄國人何時從擁抱自由秩序轉向擁戴強人呢？作者認為，轉折點在蘇聯解體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同一民調顯示，短短六年後，俄國人中只剩下20%還支持自由秩序、反對集權，高達70%轉而支持強人鐵腕治國，分歧只在於是暫時需要還是永遠需要鐵腕。而當時普京還沒有進入權力核心，不為多數俄國選民所知。所以，不是普京製造了強人強權的民意，而是擁抱強人強權的民意製造了普京。作者由此得出結論，導致普京奠定民選獨裁的不是俄國文化，而是蘇聯解體後的巨大危機（頁181-82）。

筆者認為，這一結論未免把一個複雜問題簡單化。蘇聯解體後的危機固然為政治強人的出現提供了民意土壤，但若把蘇聯解體放到一個更長遠的歷史時段觀察，很難排除歷史—文化因素在俄國人轉向民選獨裁中曾經發揮的作用。事實上，作者引用的從1989到1996年民調數據的變化，並不支持他排除歷史—文化因素的結論。柏林牆

倒塌前，蘇聯經歷了七十二年的極權獨裁，民意對自由秩序的嚮往曇花一現，幾年後重新回到支持強人獨裁的窠臼，而且持續至今。導致這種結果可能有多重因素，而不是單一原因。如果造成民選獨裁的原因是國內危機，而造成國內危機的原因又是極權獨裁帝國的解體，那麼極權獨裁又是甚麼原因導致呢？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國紛紛爆發革命，但革命後成功建立長期極權統治的只有俄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才將極權獨裁推廣到東歐和中歐一些國家。而且，東歐和中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蘇聯陣營垮台後，大部分迅速轉向自由民主。極權統治在這些國家都曾經導致過國內危機，但危機的後果卻跟俄國不同。如果排除歷史—文化因素，只是從危機的角度分析，這種現象很難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

另外，按照作者的分析，普京為了維護民選獨裁統治，要不斷製造危機。值得注意的是，普京製造的幾場重大危機無不具有鮮明的俄國歷史—文化特色，即以領土擴張為核心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入侵格魯吉亞是這樣，吞併克里米亞是這樣，侵烏仍然是這樣。每入侵一次鄰國，政治效果立竿見影，普京在俄國選民中的支持率就大幅攀升。這顯然表明，通過領土擴張製造危機，滿足了多數俄國選民的精神需求。不論經濟狀況好壞，這種精神需求持之以恆，因為它植根於國民的歷史—文化基因中。

在一些國家，獨特的歷史—文化造就了長期獨裁的土壤，而長

期獨裁又加固了集權的文化基礎。尤其是近年出現的「民主衰退」現象顯示，自由民主秩序作為一種人為的制度設計，要正常運轉，不得不依賴相應的歷史—文化土壤。在有獨裁土壤的國家，「條條大路通獨裁」，民主選舉的道路最終也通向民選獨裁。這種土壤包括一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等。

筆者不贊同歷史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但希望強調，改變歷史和文化比建立一種選舉制度更艱鉅、更漫長，也更富有挑戰性。「民主衰退」的現實也警示人們，從極權獨裁走向自由民主，並維持有質量、正常運轉的民主，除了制度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國民要打破本國歷史—文化的囚籠，拒絕做本國歷史的奴隸，認同現代文明秩序，接受現代文明價值。

六 結語

作者在本書中借用瑞士外交家拉帕爾德(William E. Rappard)的話提醒人們，「民主是和平之子，無法脫離母體生存」(頁91)。在巨大危機的震盪中，民主可能會被政治強人劫持，變成民選獨裁。不過，民選獨裁並不是蛻變的終點，而是具有旋轉門性質——它可以轉向自由民主，也可以轉向極權暴政。

從1960到2014年，世界上有64個民主政府垮台，其中48個從民主轉向民選獨裁，13個變成軍事獨裁(頁91)。在68個軍事獨裁政府中，有39個轉向民選獨裁，16個轉向民主，10個轉向一黨專政，

普京製造的幾場重大危機無不具有鮮明的俄國歷史—文化特色，即以領土擴張為核心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通過領土擴張製造危機，滿足了多數俄國選民的精神需求。這種精神需求植根於國民的歷史—文化基因中。

十年前，人們普遍認為，由自由民主蛻變為民選獨裁只有在新興民主國家才可能發生，不會出現在美國這種較為成熟的民主國家。時至2024年，媒體和學界已經難以繼續對美國民主的未來持這種無保留的樂觀態度。

15個成立了過渡政府，4個打起內戰，2個被外國佔領。同一時期，在經歷過一黨專政的64起轉型中，32個轉向民選獨裁，13個轉向軍事獨裁，13個實現了自由民主（頁103、113）。

極權獨裁因為沒有合法性基礎，比民選獨裁更需要借助經濟發展來維持統治，即追求所謂「績效合法性」。作者發現一黨專政國家跟軍事獨裁國家有個相同的規律，即嚴重經濟危機導致政權垮台，但垮台後紛紛倒向民選獨裁，並不必然轉型為自由民主體制。不只如此，垮台後的危機和動亂大大降低了它們轉向自由民主的機會，甚至基本排除了轉向自由民主的可能性（頁116）。在經濟發展遭受挫折的情況下，極權獨裁要維護統治，可能更有動力主動製造安全危機，因為「嚴重的安全危機尤其排除了封閉獨裁的完全民主化：在發生衝突之後，幾乎沒有軍事獨裁政權或一黨專政政權實現民主化。相反，在民主國家，經濟危機和安全危機預示着更有可能向民選獨裁轉型」（頁131-32）。這意味着，獨裁可以靠製造危機續命，而民主卻可能在危機中被削弱，甚至被摧毀。

十年前，人們普遍認為，由自由民主蛻變為民選獨裁只有在新興民主國家才可能發生，不會出現在美國這種較為成熟的民主國家。時至2024年，媒體和學界已經難以繼續對美國民主的未來持這種無保留的樂觀態度。11月初舉行的美國大選不是2024年的最後一場選舉，卻是本年度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一場選舉。《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刊文發問：「美國是否有防獨裁功能？」^⑦只有美國選民才能提供確切的答案。

註釋

① Koh Ewe, "The Ultimate Election Year: All the E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 2024", *Time*, 28 December 2003, <https://time.com/6550920/world-elections-2024>.

② Alec Russell, "Can Democracy Survive 2024?", *Financial Times*, 2 January 2024, www.ft.com/content/077e28d8-3e3b-4aa7-a155-2205c11e826f.

③ Aleksandar Matovski, "How Putin's Regime Survivalism Drives Russian Aggress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6, no. 2 (2023): 7-25.

④ "Do You Approve of the Activities of Vladimir Putin as the President (Prime Minister) of Russia?", 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96181/putin-approval-rating-russia.

⑤ "Putin Wins Russia Election in Landslide with no Serious Competition" (18 March 2024), 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s-presidential-vote-starts-final-day-with-accusations-kyiv-sabotage-2024-03-17.

⑥ Samuel Huntington, "Democracy's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2, no. 2 (1991): 12-34.

⑦ Richardo Rey, "Is America Dictator-Proof?", *The Economist*, 16 May 2024, 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4/05/16/is-america-dictator-proof.

劉宗坤 美國德州執業律師與研究學者